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精彩扼要地勾勒出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窥一斑而知全豹，进而使读者从中揣摩与品味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书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禁烟运动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17 世纪 40 年代，在东方，是清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在西方，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 年）英国国王与国会斗争加剧，不久爆发内战，从而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清朝开国之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经有过一番兴旺的气象。康熙皇帝（1662～1722 年在位）励精图治，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到乾隆皇帝（1736～1795 年在位）初期和中期，国势达于鼎盛。这 100 年，史称“康乾盛世”。到 18 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并没有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也未能得逞。

19 世纪之后，封建主义的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了。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快一慢，国力对比的一升一降，中外关系的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急遽的变化。



道光帝像

乾隆末年，清王朝已明显地由盛转衰。自嘉庆朝（1796～1820 年）至鸦片战争前夜，整个封建制度已危机四伏。

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到鸦片战争前夜，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但是，清政府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工业技艺视为“奇技淫巧”。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林则徐塑像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地主阶级、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这种时张时弛的土地兼并、集中现象，到了19世纪初更是惊人。据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统计：直接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83万顷（每顷100亩）。其他大地主大官僚也占有大量土地，北方的官僚豪富，有的拥地数百万亩，或“膏腴万顷”；江南一带，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在百分之一二十的人口手里，以致“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

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政权，鸦片战争前即已腐朽不堪。外迫强敌，祸在眉睫，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道光皇帝（1782～1850年）虚骄自大，封疆大吏闭塞无知，吏治黑暗，贿赂公行，朝廷充斥“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的老朽官僚；地方官吏，“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也逐渐瘫痪。以刀、矛、弓箭、短剑、藤牌、甲胄和少量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兵器装备起来的八旗兵、绿营兵，鸦片战争前夕约有90万（内八旗兵为22万）。不仅兵器落后，而且营务废弛，百弊丛生。当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奏称：“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或“粮多冒领”，或“老弱滥充”，或“训练不勤”，或“约束不严”，“凡此诸弊，翻为兵蠹，稍有缓急，其何可恃？”驻防京城的八旗兵，竟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而相聚赌博。有些海防要塞，使用的还是300年前的旧炮。至于沿海水师所用战船，大多是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镇压和消弭汉族知识分子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排满”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入关之初，就采取怀柔与高压相结合的手段，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封建士大夫被迫面向故纸，背对现实；或沉湎科举考试，猎取功名利禄；或从事繁琐考据，不敢触及政事。他们闭目塞聪，孤陋寡闻，甚而“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

随着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从嘉庆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起义，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



清·玉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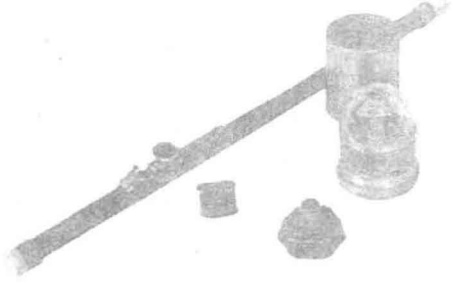
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扩张和掠夺殖民地，从17世纪50年代至18世纪60年代，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成为显赫一时的“海上霸王”。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过程大体完成。据统计：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1953台，纱锭900万枚，年产生铁102万吨，煤3000万吨。这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

家，它的炮舰走遍全球，它的工业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它的贸易额在各国对华商务中居压倒优势。适应炮舰政策和经济掠夺的需要，英国的军事工业也在急速发展。当时，它已经拥有主要靠帆力航行，但也装备了蒸汽机的海军舰船，这种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装甲舰船，每艘配备几十门精良大炮，陆战部队则使用新式的来复枪和各式大炮。

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世纪20年代起，工业革命在国内大规模地进行。到1830年，法国拥有蒸汽机625台，1837年生铁产量达59万吨；从1815～1840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3倍。鸦片战争前夕，法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二位，但对东方的商品贸易额仍很小。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取得政权的。鸦片战争前，它的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美国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北美的人参、毛皮、棉花，南洋的檀香，从土耳其转卖的鸦片，以及从英国贩运的工业制造品；带回去的则是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南京布”（即土布）等。优厚的利润和美国政府的保护与帮助，使美国资产阶级“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货市场”。

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实行闭关政策。



吸食鸦片用具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对外通商。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乾隆皇帝，在广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后，清政府又陆续颁发《民夷交易章程》（1809年）、《防范夷人章程》（1831年）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等，作了苛细而繁杂的规定。构成闭关政策的另一项措施，是1760年在广州恢复的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亦称洋行、洋商、洋货行）组成的垄断性组织。它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清政府给参加公行的行商以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公行商人则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规礼，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等。



销烟池旧址

当时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着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了西方工业品的侵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政策，即所谓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既高又不耐久，不能和土布竞争。印花布虽然在19世纪20年代初叶被认为“愈洗愈鲜”，胜于“一洗即模糊”的内地印花布，但实际销路更有限。棉纱输入值也远不及

印度进口的棉花（鸦片战争前夕，印棉进口年约25万包，值100多万英镑）。30年代初叶，英国人已经了解：中国自己植棉很广，但消费棉花数量甚大，在中国市场上容易推销的是棉花而不是纱、布等制成品。从20年代末叶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一倍多，棉纱增加了五倍多，但每年总值不及70万英镑，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过100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约值1000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有二三百万银元，合计在600万英镑以上。正当的贸易平衡有利于中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利的情况，还要提到的是，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每年经英、美商人输出土布多至300多万匹，远销美国、南美洲。在30年代输出量减少，但经英商输出的每年也还有几十万匹。

鸦片贸易

1757年，也就是清政府下令闭关的同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对华贸易急剧增长。为了追逐利润，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公开对华进行鸦片贸易。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因为它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进口。17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

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产于印度的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以及土耳其和波斯鸦片。西方殖民者侵入印度后，葡萄牙人首先从果阿、达曼向中国澳门贩运鸦片，但数量不大，1729年清政府下令禁烟前，每年不超过200箱。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后，迅即夺去其他各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在孟加拉收购鸦片的权利，于1773年从加尔各答向中国试销鸦片成功。从此，英国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



林则徐像

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华伦·哈斯丁（W. Hastings，1774年第一任印度总督）制定了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政策，帮助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以垄断方式来增加生产，鼓励出口，毒害和掠夺中国人民。哈斯丁在印度总督任内一再强调，“不要干涉鸦片收入”。1797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了制造鸦片的垄断权。

清政府是三令五申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雍正七年（1729年）颁发第一道禁烟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刑，但对吸食者尚未论罪。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60年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迄督抚衙门，先后发过45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但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朝整个官僚体制腐败，明发禁令，暗受贿赂，因此不管是道光以前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还是道光时期加上的“正本”（禁止官民吸食），都没有能收到禁烟的预期效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则徐手书对联

烟毒在中国的泛滥

从19世纪起，鸦片开始大量流入中国。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最初的20年中，英国自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为4000余箱（每箱约120斤）。30年代以后，鸦片输入量迅速增加，1838～1839年已达到了35500箱。英国资产阶级利用肮脏的鸦片贸易开辟了中国市场，同时也发展了印度市场。英国在印度大量销售棉纺织品及其他工业品以购买鸦片，然后再用这些鸦片运到中国换取它所需要的丝、茶等物。在英—印—中即纺织品—鸦片—丝、茶这个三角贸易关系中，英国资产阶级获取了双重的利益。

由于鸦片输入额的激增，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中的长期优势，由原来的出超变为入超，贸易逆差的差额越来越大。从19世纪30年代起，英国输入中国货物的总值中，鸦片已占到了50%以上。英国通过鸦片每年从中国掠走的银元达数百万之多。

同时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的，还有美国和俄国。美国主要是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来。为了抗拒中国水师的缉私，美国的鸦片贩子专门制造了一种配有武器装备的“飞剪船”。鸦片战争前，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仅次于英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沙皇俄国也从中亚向中国偷运鸦片。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祸患。鸦片摧残人的身体健康，损伤人的智力，麻痹人的意志。在道光时代，鸦片的销售已遍于全国。据估计，中国受鸦片毒害的人数约有200万之众。

非法的鸦片走私，使中国蒙受到严重的危害。

首先，鸦片输入的增加，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致使清朝的财源日益枯竭。根据不完全统计，1830年由英商运出的就有670余万元。鸦片战争结束前，一年流出1000多万元。十余年中，流出银子总数达一亿数千万元。

其次，大量的白银外流导致了银贵钱贱的后果。18世纪末，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000文左右。到鸦片战争前的1838年，则增加到一千六七百文。农民完粮纳税是以白银计算，过去卖一石谷可纳税银一两，而今差不多要用两石谷。农民的负担因此而加重，生活日益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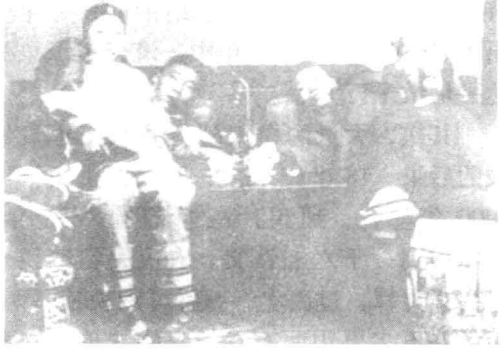
第三，鸦片走私的结果，使清朝的政治更加腐败。鸦片贩子贿买清朝官吏，共享其非法收入。清政府虽多次颁布谕令、文告禁烟，然而鸦片走私却日益猖獗，这与吏治的腐败紧密相关。

第四，清军官兵中吸食鸦片者广泛存在，这使清朝的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银荒又引起商业的停滞和物价的上涨。烟毒泛滥的影响波及全国各阶层人民。

虎门销烟

1836 年～1838 年的几年中，鸦片问题引起清政府的讨论。统治集团出现了主张严禁和主张弛禁两派的争执。1836 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品，理由是政府可借此增加大笔税收，弥补财政困难。弛禁派这种妥协主张，是当时官僚政治苟且因循病入膏肓的表现，也是统治集团中若干大小官僚不肯放弃从鸦片贸易营私肥己的反映。这种势力以当权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等为代表。

穆彰阿历任各部尚书、大学士，值军机十余年。琦善任直隶总督也有十年。他们反对一切改革，揽权营私，深得道光帝的信任。其他军机大臣如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另一军机大臣王鼎不与穆彰阿等苟合，但也不敢公开支持反对派。弛禁主张已由广东官吏奏准，以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嶟反对，因而搁置。



清人吸食鸦片的情形

1838 年 6 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痛陈鸦片祸害，揭发官吏包庇，主张严惩吸烟者以遏制鸦片的输入。严禁派的主张得到舆论的广泛拥护，取得了胜利。道光帝命令负有清望而且办理禁烟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讨论查禁事宜。两广总督邓廷桢从依违犹豫转而认真禁烟，12 月 12 日，广州爆发了一万多人的群众示威，反对英、美等国暴徒干涉广东当局在商馆前处绞烟贩。到了年底，道光帝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赴广州查禁鸦片，并命令由他节制广东水师。

1839 年 3 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出告示晓谕军民绅商，凡吸食鸦片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同时还指名捉拿贩烟要犯。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得到了广州人民的大力支持，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检举鸦片贩子。虎门附近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一发现走私鸦片的商船，立即遍吹螺号，集合渔船，前后纵火，将其烧毁。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推动下，查禁鸦片的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这使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大为增强，向外国烟贩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在林则徐领导下，禁烟运动迅速趋于高涨。



龙纹建鼓

英国资产阶级阴谋破坏这场禁烟运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

地潜逃，并阻英商缴烟。林则徐接到当地群众的禀报后，派人监视洋馆，同时下令停止了中英贸易。义律看到阻挠缴烟的计划无法实现，转而要求英商接受缴烟的命令，同时劝美国商人也一起缴烟，声称烟价统由英国政府付给。义律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中国处分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为英国发动战争制造借口。

在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压力下，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鸦片2万多箱，约有230多万斤。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率领地方官吏，在虎门“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将缴获的全部烟土当众销毁。虎门销烟这一伟大行动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

林则徐领导的这场禁烟运动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查禁鸦片的本身。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的输入。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的基本原则是：“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并且具结合证以后也不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军队，准备武力解决。7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伤重致死。林则徐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9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10月，义律率英舰又闯入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进口的英国商船，并与中国师船接战，是为穿鼻之战。此后，英军曾在10天之内6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

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林则徐进行了积极的防备。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道，着手整顿水陆两军，下令增修虎门炮台，在虎门海口安设木排、铁链，购置和仿制西式大炮，以加强防务。他招募数千名渔民、蜑户、丁半，编为水勇，精练夜袭火攻之法。同时还发布安民告示，与当地群众相约，如英军闯入内河，许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的这些备战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1839年12月，道光皇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林则徐奉旨于1840年1月宣布断绝中英贸易。在此之前，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出兵侵华。



虎门炮台大炮

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来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航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将此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鸦片战争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曾召见大鸦片贩子查顿，在一起拟订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具体计划。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为他们发

动战争的导火线。

1839 年 10 月 1 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 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6 月，英国侵略军 4000 人及由 48 艘舰船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了。

战争从 1840 年 6 月下旬开始到 1842 年 8 月下旬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

战争的第一阶段，自 1840 年 6 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 1841 年 1 月义律发布所谓《穿鼻草约》为止，历时 7 个月。

英国侵略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实行了封锁。广州的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者早已严加戒备。懿律见无隙可乘，按原订计划，掉转船头，率兵北窜。7 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在此也未能得逞。英舰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了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有部分兵船北上，于 8 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项无理要求，并且声称，如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便要“相战不息”。



虎门炮台遗址

定海的失陷使清政府大为震动。妥协派趁势散布流言飞语，对抵抗派进行攻击。他们把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归罪于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声称：“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至激变”。在这种投降理论的影响下，道光皇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国侵略者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他下令不必对驶入海口的英船开枪开炮，同时指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河口，与英国侵略者谈判交涉。

琦善在同侵略者的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了琦善的保证后，遂于 9 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 9 月 17 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了上风。

琦善 10 月离开北京，1 月到达广州。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他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务，遣散了水勇、乡勇，为侵略者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12 月，琦善与英人开始谈判。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割让香港一事，他不敢作主，表示要“代为奏恳圣恩”。1841 年 1 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角、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斗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钦差大臣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1 月 20 日，义律单方面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 600 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项条款。1 月 26 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

战争的第二阶段，自 1841 年 1 月清政



虎门威远炮台遗址

府宣战始至5月《广州和约》订立止，历时4个月。

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就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并从各省调集了军队17000人开赴广东。中英双方重新进入战争状态。

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先发制人，于2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62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受伤多处，血染衣甲，仍坚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事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虎门陷落，英军占领了十余座炮台和1000余尊炮位。广州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

4月，奕山等人及各省调来的军队先后齐集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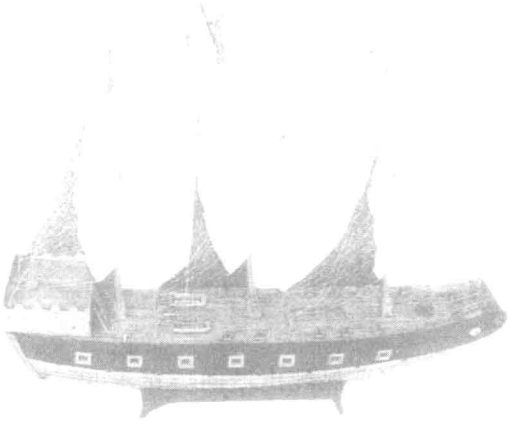
奕山抱定“患不在外而在内”的宗旨，希图侥幸取胜。5月下旬，他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等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发炮轰击城内。奕山等人在城上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5月27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6天内撤驻广州城外；7天内缴纳600万元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

战争的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始至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12个月。

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穿鼻草约》的消息之后，大为不满，认为从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璞鼎查为全权公使。

8月下旬，璞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9月，英军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6个昼夜，重创英军。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殉难。10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是两江总督裕谦及浙江提督余步云。裕谦集众立誓，愿与镇海城共存亡。在战斗中，他登城指挥，率军抵抗。而余步云却临阵脱逃。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

浙东三城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为了挽回败局，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皇帝下令重新迎战。10月18日，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同时从江西、湖北、安徽、



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水师兵船（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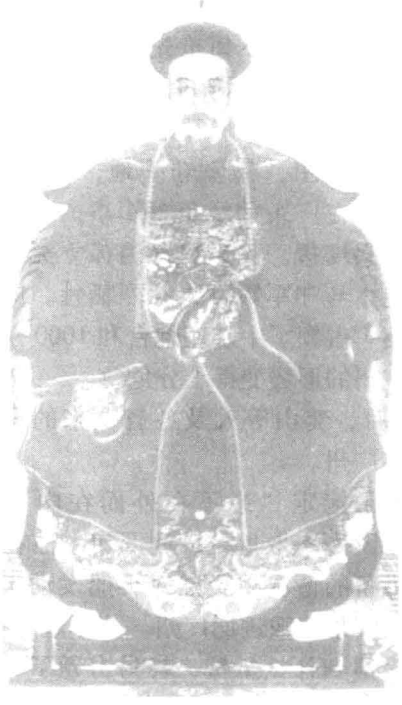
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近2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上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从北京到浙江足足走了4个多月，于1842年2月到达绍兴。奕经同奕山一样昏庸无能，对战事不做认真准备。3月，清军从绍兴分兵三路袭取镇海、定海、宁波三城。因作战消息早有走漏，英军已有准备，清军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

为“外患”、“内忧”所困扰的道光皇帝深恐后者甚于前者，为了维持其统治，宁愿屈膝投降。于是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被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赶往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者拒绝了议和的请求，他们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按照原订计划，英军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

1842年5月，侵略军退出宁波和镇海，集中兵力攻陷了海防重镇乍浦。6月，英舰进入长江，全力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领守军5000人顽强抵抗。他亲至炮台指挥作战，给敌军以重创。担任后援的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致使陈化成腹背受敌，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军继续溯长江西上，7月下旬进攻镇江。守卫镇江的京口副都统海龄率部殊死奋战，6天之后，侵略者攻陷了镇江。8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伊里布先后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耆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耆英、伊里布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英军强占香港

英军从大沽南回广东，就谋求占领新安县的香港来替代舟山的定海，作为他们新的根据地。



关天培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英国人懂得要清廷轻易把香港割让给他们，决不可能。起初，在义律同琦善提出的十四项要求中，只是笼统地提出像澳门一样给予大码头一处，让英国人永久居住。第二次穿鼻战后，英军乘打胜的机会，压琦善割让香港。1月18日，英军释放被俘士兵何以魁，让他带回致关天培书。提出“香港让予英国”的要求。20日，义律通过澳门当局向琦善转交《穿鼻草约》，主要内容：一、将香港让于英国；二、赔款六百万元；三、两国官吏平等相待；四、限于阴历新年初十前恢复广州贸易。25日，义律在虎门外狮子洋莲花山，同琦善会晤时，又当面递交了《穿鼻草约》的照会。琦善害怕英军进攻广州，不同其他高级官员商量，擅自同意广州开港通商。对给予香港一节，他表示本人没有意见，但天朝土地他无权处理，待请示朝廷批准后，再行盖用钦差大臣关防，签字生效。后来，道光帝严厉斥责琦善这是“一片呓语”。英国侵略者则不等清廷的答复，于1841年1月26日，派遣硫磺号，运载侵略军，强行占领香港。在香港张贴告示，称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获知英军占领香港的消息，十分震惊，于2月11日报告朝廷，道光帝极为震怒，于25日指示内阁：“琦善擅予香港，辜恩误国，着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由此可见，英国占领香港，清政府是不同意的，琦善也没有在《穿鼻草约》上签字，这纯系英国抢占别国领土的强盗行径。

英国既得香港，由于定海人民对英军的激烈反抗，几千名英国官兵在物资供应上的极大困难，人员大量生病和死亡，加上英军又急于想用定海换回被俘的安突德上尉和拿布夫人，这些因素促使英军尽早撤出定海已经成为“必要的行动”，英军于1841年2月24日撤离定海，南下广东。

清册封达赖

顺治十年（1653）四月二十二日，顺治帝封达赖五世为“达赖喇嘛”，确定了达赖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

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嗣位于明崇祯十年（1637），当时即遣人至清盛京进书



敕封达赖的金册

献方物，清也遣使通聘。清入关后，多次派人前往西藏，延请达赖。顺治九年（1652）十二月十五日，达赖五世至京师，在南苑谒见顺治帝，清廷给予达赖隆重礼遇。次年正月十一日和十六日，福临两次在太和殿宴请达赖五世，并赐金器、彩缎、鞍马等物。十七日，又命诸王依次宴请。二月二十日，达赖五世辞归，清廷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同贝子顾尔玛、吴达海率八旗官兵护送至代噶地方。四月二十二日，



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罗卜藏嘉木错觐见顺治皇帝（布达拉宫壁画）

顺治帝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将封达赖五世为达赖喇嘛的金册、金印（文用满、藏、汉三种文字）送往代噶地方。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从此正式得到“达赖喇嘛”的称号。五月十日，达赖从代噶起程回藏。六月十二日，达赖喇嘛上表谢颂赐册印及封号，附献马飞、琥珀等物。

军机处设立

雍正十年（1732），军机房改为军机处，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清廷最高决策机构，皇权统治进一步加强。

清初，清廷中央政府机构多仿明朝建制，又有自己的特点。既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内阁作为中央主要行政机构，同时又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居于内阁之上，作为最高的中枢决策机构，互相牵制。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维护满族贵族特权地位的机构，也称国议。其成员由满族贵族诸王及总理旗务大臣组成。后来历任皇帝为提高皇权，不断对王公旗主势力加以削弱，再加上后来议政王大臣“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议政制度慢慢衰落下来。康熙十六年（1677）设立南书房（亦称南斋），并任命亲信大臣撰拟谕旨，执行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权势甚重。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受到削弱。



清军机处外景



汉文廷寄

雍正即位后，对诸王的权势作了进一步的限制。首先他收回诸王的军权，接着在雍正七年（1729）设立军机房，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蒋廷锡、张廷玉等密办军需事宜，赞襄军务。后来在雍正十年（1732）正式改称为军机处，秉承皇帝谕旨办理各种机要事务，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处理军国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

参加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召入。其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等，为首者称为“领班”，也称“首枢”。军机大臣之下尚有军机章京。一般尊称军机处为枢密，称军机大臣为枢臣，军机章京为枢曹。

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清代皇权进一步的提高，封建专制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八日，土

尔扈特蒙古重入中国版图。

土尔扈特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17 世纪初，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意图兼并土尔扈特，迫使土尔扈特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但仍和清朝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18 世纪 20 年代以来，俄国扩张势力对土尔扈特部加紧控制和迫害，苛征苦敛，徭役不断，又征子为质，蔑视黄教，使土尔扈特人思归故土。18 世纪中叶，沙俄在对外扩张的战争中，逼迫土尔扈特人充当炮灰，死者七八万，而且还将 16 岁以上的男丁全部赶赴战场，意欲歼灭土尔扈特人。这种可怕的灭族之灾迫使土尔扈特断然摆脱沙俄的控制，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首领渥巴锡率领下，重返祖国。他们冲破俄罗斯军队



乾隆皇帝所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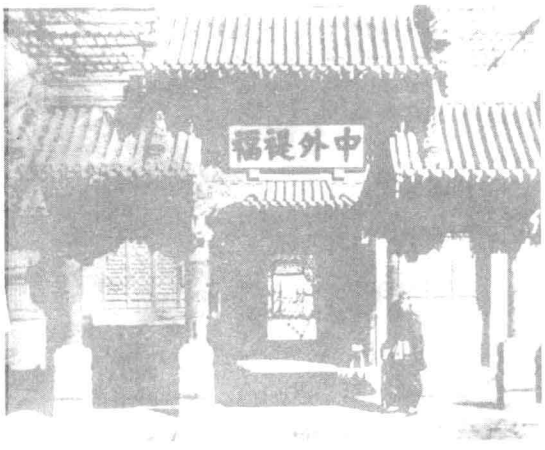
蒙古盟长印　这方乾隆四十年（1775）款“乌纳恩殊来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盟长之印”，是清朝在蒙古地区以法律形式因俗而治的一个历史见证。

的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忍受巨大牺牲，行程万余里，历时 8 个月，终于在次年六月回到新疆伊犁，部众仅剩一半。土尔扈特回归后，乾隆对此事十分关切，下令拨银 20 万两，置备米麦、羊裘、布棉、毡庐、盐茶、靴帽，市马、牛、羊 26 万 5000 余，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犁河谷及科布多地区驻牧。同年九月，乾隆在承德接见了渥巴锡，对其优礼有加。不久，乾隆封渥巴锡为卓理克图汗（蒙古语英勇之意），以表彰他的功绩。乾隆还亲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自此以后，漠西厄鲁特蒙古全部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总理衙门成立

1861 年 1 月 20 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

总理衙门虽以外交和商务为其基本职责，事实上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也全部由其负责。后来扩展到只要涉及“洋”字，一切事务都推到总理衙门中来，铁路、开矿、兵工厂、兴办学校等事务也都由总



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理衙门经管。

由于总理衙门负责对外交涉，所以关于外情新知，较之其他满清贵族，均先有所接触。同治初年衙门请设同文馆以培养外语人才，乃开清廷引进西方新知之开始。其后，又次第派遣学员游学、设新式学堂、搜集西书、改良考试制度等等，对传统体制的冲击非常之大。

总理衙门初成立时，由清廷任命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总理衙门的职官，主要分大臣和章京二级，属于特殊官制。总领大臣由皇族担任，第一任总领大臣为恭亲王奕䜣，前后长达28年；1884年4月以后由庆亲王奕劻接任，前后共12年。总理衙门体制分成5股，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每股分管与某几个外国有关的事务及若干洋务。另外有司务厅、清档房。总理衙门内充满了守旧分子，官场积习重，办事效率低下。

总理衙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办理对外事务的行政机构，标志着清朝封建专制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已被打破。光绪二十七年（1901），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台湾建省

光绪十三年（1887），台湾建省。

台湾孤悬海外，清廷曾设知府管辖，隶属于福建省。鸦片战争后，屡遭外国窥伺、侵略。到日本侵台时，台湾危机才逐渐引起清廷注意。其时，沈葆桢抚台，改添州县，设二府四厅八县，初步奠定了行省规模。中法战争，法军攻台湾，危机再度发生。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十六日，闽督杨昌浚、台抚刘铭传会奏朝廷，力陈台湾建省的必要性。清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下辖三府一州五厅十一县。新设首府为台湾府，辖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和埔里社厅；原台湾府改为台南府，辖安平（原台湾县）、嘉义（原诸罗县）、凤山、恒春四县和澎湖厅；台北府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和基隆厅、南雅厅；添设台东直隶州，由原卑南厅升置，辖花莲港厅。这是中国历史上台湾的首次建省。在清朝统一政权管辖下，台湾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一定发展。

北洋海军建成

北洋海军相对起步较晚，起点也最低。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时，仅有4艘轮船。然而，经其大约20年的苦心经营，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北洋水师在军事实力、基地建设制度、训练以及近海防御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等方面已基本达到同期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清代唯一的一支具有近代规模的正式海军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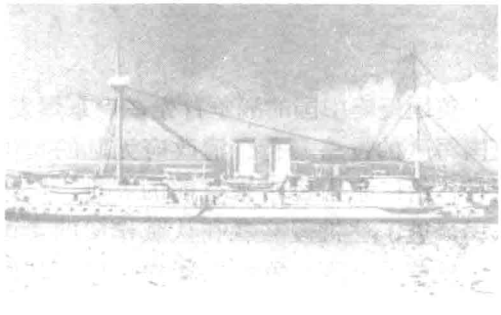
李鸿章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经费方面，他极力游说，使清政府将发展海军的财力绝大部分投入北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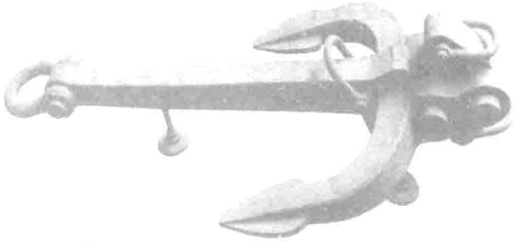
刘公岛上清朝北洋水师提督署遗址

在1885年10月组建的海军衙门，他独揽了实际的权柄。当海防经费由各省支付以后，北洋海军的8艘铁甲巡洋舰的经费却由海军衙门直接拨给。从1875年至1894年，北洋海军平均每年的经费超过100万两白银，是其他各路海军所难以企及的。李鸿章还利用权势将各路海军中的先进舰船和装备调入北洋，更拉大了与其他海军的距离。为了避免分散发展，他还将原属直隶、奉天、山东三省的军舰统一于北洋，使力量相对集中。到1888年，北洋海军已拥有25艘各类舰船。北洋海军正式建军，成了一支具有自己独立的作战任务、作战能力和保障系统的近代化舰队。

为了保证这支装备精良的舰队的作战能力，北洋海军加紧了它的体制、基地和后勤保障系统的建设。在海军衙门的参与下，拟订并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以英国的海军章程为主要参考，补充了德国的一些制度，根据中国的实际，将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核、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14个大项制度化，内容细致完备，是甲午战争前清朝军事制度的最高成就。他们特别重视军官的培养，北洋海军的中高级军官大多是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曾留学过英、



北洋舰队主力舰——镇远号



“镇远”舰的铁锚

法，直接接受过西方海军的教育和训练。为了学习外军的先进经验，北洋海军以合同的方式，先后聘请了几十位外国人担任舰队的顾问和教练以及水师学堂的教习，十分注意对他们的管理，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形成了一整套规定。

在完善舰队体系、增强作战能力的同时，北洋海军进行了以大沽、旅顺和威海三大基地为主体的、集近海防御和后勤为一体的保障体系建设。大沽船坞是北洋海军建立的第一个小型舰船维修基地。附近有完整的配套工厂及供给码头。威海军港完成于甲午战争前，是北洋海军驻泊操练的补给基地，北洋海军提督衙门就设在这里。

先进的武器装备，完整的保障体系，颇具近代特色的制度和训练，使北洋海军成为当时远东国家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之一，在世界近代海军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兴中会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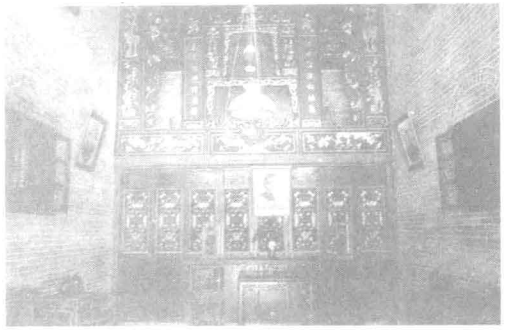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光绪十九年（1893），孙中山在广州行医的时候，曾与陆皓东、郑士良等集会，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尚未建立组织机构。



1896 年断发后的孙中山

光绪二十年（1894）初，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不被采纳。同年十月，孙中山前往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 20 多人，成立兴中会。其章程规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在入会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纲领。会员由几十人增加到约一百二三十人，多数为华侨中、小资本家，也有部分工人、会党和知识分子参加。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推黄咏商为首任会长。不久准备在广州起义，但事情败露，陆皓东等被捕牺牲，孙中山逃亡国外。光绪二十五年（1899）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次年年初出版。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兴中会又派郑士良在惠州（今广东惠阳）三洲田发动起义，因为外援没有按计划来到，起义队伍中途遣散。



在广东省中山市（原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

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该会先后在横滨、长崎、旧金山、台北、河内及南洋、南非等地遍设分会，主要在华侨中发展组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兴中会改入会誓词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兴中会与华兴会和光复会等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

三元里之战

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首先在广东爆发。英国军队的侵略暴行，清政府无耻的卖国行径，给广东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广东人民恨透了这批侵略者和认贼作父的卖国贼，反英、反清斗争特别猛烈。早在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和武装反击英国侵略军的时候，广东人民纷纷组织团练和参加水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